

郁达夫日记集



郁 达 夫
日 记 集

胡 从 经 编

陆 丽 人 民 出 版 社

郁达夫日记集

胡从经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9 字数 297,7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10094·501 定价：2.10元

(内部发行)



郁达夫



郁达夫留学日本时留影

（日本 堀内齐氏藏）

大地春風十萬家
偏安原不損
繁華輸陣表
已傳關外冊
帝文原出海
涯北闕
三書終
笑雨不
暮年一第亦微瑕
千秋滿信履
同甫氣壯辭雄
節較差

郁達夫詩箋

壬子春

郁達夫

林氏山丘香齋、謝家
三度院繁霏、殘冬待
思知何處白香寒、梅
月下解

己未初春

郁文



郁达夫留日期间书赠小林清八郎氏诗笺



郁达夫一九三四年留影

病後汗擔風先生有贈

冉冉浮雲日影黃
維摩病後氣凋傷
鋒煙破國家何在
知己他鄉道最忘
畧有輕才追杜牧
絕無功業比馮唐
最憐善世何東望
十載馳驅鬢欲霜

郁

文未足
年

十月九日



郁达夫一九三六年留影

漢公：書成後，無想題也。作一首。

一之廿七錄口口。

出韻者，躬極有景，而憐其公，
為標文，由生，能合題。

原款以作卷。

真多漸鮑叔能憐叔也。怕落夫

要罵人泥馬。縱譎終少骨。坑灰

未冷待揚塵。國門居。隨免。原傳。

世何必。臣雄再。劇。春。

世何必。臣雄再。劇。春。

郁达夫书赠林语堂诗笺

序 引

郁达夫是“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以回荡新声、闪烁异彩的创作，在新文学发展的途程上留下了深深的辙痕。

充分显露郁达夫文学才华的是他的小说和散文。“日记文学”则为郁达夫所倡导。早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他在《日记文学》一文中揭示“日记体”是散文中“最便当的一种体裁”，且可消除其他体裁易于招致的“真实性消失”的“幻灭之感”。在评介传世的中外日记（如吴毅人的《有正味斋日记》、瑞士亚米爱儿的日记等）时，认为读日记中的“不朽之作”，比读某些有始有终、变化莫测的小说还要有趣。他强调说：“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尔后，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又写了

《再谈日记》，指出日记在于“备遗忘，录时事，志感想”，力戒“骄矜虚饰”，只有“坦白地写下来的关于当时社会的日记，才是日记的正宗”郁达夫的日记观，与同时代的进步作家是一致的，例如茅盾在《日记及其他》一文中，也曾提出要防止那种“自夸而诩人”的伪日记的倾向。

郁达夫不仅是日记文学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实践者。他曾多次将自己的日记结集出版。一九二七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日记辑《日记九种》（即分《劳生日记》、《病闲日记》、《村居日记》、《穷冬日记》、《新生日记》、《闲情日记》、《五月日记》、《客杭日记》、《厌炎日记》等）；一九三五年七月又“汇录改削”成了包括《日记九种》在内，复加《沧洲日记》、《水明楼日记》、《杭江小历纪程》、《西游日录》、《避暑地日记》、《故都日记》等，同由北新书局出版的《达夫日记集》；其间，还将编定的散篇日记辑入文集，如将《沧洲日记》、《水明楼日记》编入《忏余集》（天马书局，一九三三年二月初版），旅游日记《西游日录》等编入《屐痕处处》（现代书局，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版），《南游日记》等编入《达夫游记》（上海文学创造社，一九三六年三月初版），《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闽游日记》、《浓春日记》等编入《闲书》（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六年五月初版）。不及辑集而散见于报刊的则有一九二一年十月间的《芜城日记》（刊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三四年一月的《一月日记》（刊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艺日记》），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的《回程日记》（刊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的《青年界》第十二卷第一号“日记专辑”）等。郁达

夫生前编定并发表的日记凡二十四章，起自一九二一年，迄于一九三七年。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郁达夫是生前将自己日记发表得最多的一位。他的日记，为我们展现了绚烂的文采，使我们从那清丽曼妙的叙述中，获得了心旷神怡的美感；为我们描摹了时代的眉目，使我们从那爱憎分明的褒贬中，认取了历史前进的脉络；为我们速写了文坛的脸谱，使我们从那纷纭陆离的状绘中，窥测了聚合离异的分化；为我们倾诉了自我的心曲，使我们从那率直无伪的表露中，透视了心灵动荡的轨迹。

在鲁迅主编的《语丝》四卷三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上曾刊有《日记九种》的新书预告，其中写道：“在这部日记里，我们不仅可以欣赏这部日记的自身，并且藉此而赤裸裸窥见郁达夫先生的实生活，使我们读他的其他作品时，能以得到更深切的了解。”事实上也是如此，襟怀坦白、真实无伪，正是郁达夫日记的特色。关于日记，鲁迅曾经说过：“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全都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象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华盖集·马上日记》）在此之后，鲁迅还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中就郁达夫《日记文学》的或一论点提出商榷，认为读文艺作品时所引起的“幻灭的悲哀”，症结在于“以假为真”，读者从“真中见假”之后才“极容易起幻灭之感”，故而反对日记流于“做作”（譬如李慈铭在日记中“钞上谕”希蒙“御览”）、“装腔”（譬如生造杜撰《林黛玉日记》以鬻

钱)之类的矫饰与虚伪。郁达夫在《再谈日记》中赞同鲁迅上述观点,认为“此论极是”。当然,他自己的日记是与“做作”、“装腔”等绝缘的。

郁达夫在日记中坦诚地记录了自己情感的变迁,心理的创痕,爱情的波折,乃至行为的颓放,同时代还没有一个作家如此公开过自己的“私生活”,但我们绝不可据此而轻易冠以“颓废文人”的谥号,因为不能单纯从字面上来衡测作家此时此地的是非曲直,若要知人论世,首先要剖示作家生活的历史环境。当时的时代是一个窒闭黑暗的畸形社会。郁达夫的某些放浪形骸的行为,也是变相的对那个噬人社会的抗议与反拨,当然也不排斥作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我们仔细审视,透过藉妇人醉酒以抒愤懑的现象,在那些笑傲江湖的牢骚后面,仍可谛听到一颗热爱国家民族、企望光明自由的赤子之心的搏动。在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祖国前途的执着,民众命运的关切,乃至革命事业的同情。郁达夫曾说过:“逢着了大事,受到了些怎么的激刺,写下了怎么样的批评,也是日记中常有的事”(《再谈日记》),他的若干“备遗亡,录时事”的日记,实际上可作为历史备忘录看,时代前迈的跫音常从中得到回响,例如在最早发表的《芜城日记》(一九二一年十月二日至六日)中,记述了初到安庆任教,目睹“逐李罢市”民众运动的成功,感到了由衷的欣喜,情不自禁地在日记中歌呼:“民众终究战胜了。无理的军阀,军阀的傀儡,终究在正义的面前逃避了。”面对那些表明胜利的“暴风的遗迹”,作家亢奋地预言:“‘将来’是我们的东西。”而对于祸国殃民的达官贵宦,对于敲骨吸髓的豪绅地主,对于荼毒生灵的军阀土匪,则表示了切齿的痛恨,“把这些人杀尽了 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至于苦到这一步

田地。大同世界，就可以出现了。”同时，对于啼饥号寒的民众，则又深切地寄予同情、殷切地赋予厚望：“同胞呀，可怜的农民呀！你们经了这许多兵灾，旱灾，水灾，怎么还不自觉，怎么还不起来同那些带兵的，做（总统总长以及一切虐民的）官的和有钱的人拚一拚命呀！你们坐而待毙，倒还不如起来试一试的好呢。不管他是南是北是第三，不问他是马贼是强盗，你们但能拚命的前进，就有希望了。”其时，正是“五四”巨潮掀起后，大革命方兴未艾之时，作家在日记中强烈地表达了对于国民革命成功的瞩望与期待。

大革命的狂飚掀起之后，郁达夫对于它的拥戴与赞颂在日记中也留有佐证，例如一九二七年初，国民革命军攻克福州不久，他自粤返沪途中过此，身处胜利的气氛中，欣喜地写道：“革命军初到福州，一切印象，亦活泼令人生爱。……大有河山依旧，人事全非之感。”（《村居日记》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条）与此相对照的是，当他亲眼目睹了孙传芳镇压上海工人起义、残酷虐杀无辜民众的暴行后，悲愤地写下了：“大约这些无辜的良民，总难免不被他们杀戮，这些狗彘，不晓得究竟有没有人心肝的。”（《新生日记》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条）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则表示了由衷的钦仰：“上海的七十万工人，下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我们在街上目睹了这第二次工人的总罢工，秩序井然，一种严肃悲壮的气氛，感染了我们两人”（《新生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条），此后不久，郁达夫也投身入这一革命的洪流：“吃过午饭，跟了许多工人上街去游行，四点钟回到出版部里，人疲倦得很”（《新生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条）。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新军阀发动政变，大肆屠戮革命人民之时，他在当天的日记里

写下了：“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闲情日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条），直面指斥独夫蒋介石的叛卖革命，并在文字上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包括《闲情日记》在内的《日记九种》就是在“四·一二”后不久的同年九月出版的），这在当时中国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不久，又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有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帮他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命革，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奋斗，我也不甘再自暴自弃了。”（《闲情日记》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条）。

郁达夫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作家，虽不信仰却也赞同马克思主义，早年就曾宣称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系“从马克斯的《资本论》脱胎而未”（《芜城日记》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条），而且更从切身的体验中分清了是非曲直，从而同情并拥戴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这种在法西斯专制恐怖统治下的可贵感情，也时常透过禁严的文网而闪现出来，例如他在评析日本作家江马修的长篇《追放》时说：“中间写主人公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所逼迫，终究不得不走上共产主义的一条路上去的地方，很可以使人感奋”（《新生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条），甚至希冀“真正的共产政府”有实现的一日（同上）。稍后，更明白地宣示：“我所希望的，就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五月日记》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条）以上无不表现了这位进步作家的政治倾向与胆识。

基于“救我民族”的爱国信念，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趋深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际，郁达夫在日记中更常常流